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党的思想解放

叶 兵, 钟玉海

(合肥工业大学 人文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自 1992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三次思想大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 使我党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 第二次思想解放, 深化了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 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 第三次思想解放,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基本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

关键词:思想解放;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本质; 所有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图分类号: D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4-0016-04

On Liberations in Mind of our Party Since 90s, 20th Century

YE Bing, ZHONG Yu-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Hefei Technology Universit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199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three times great liberations in mind, the first time liberation had made our party understood the basic issue of what is socialism and how to construct socialism, then the second liberation had deepen the recognitions to ownership problems and had swept the barriers to construct socialism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hile the third time one has come up with the important idea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so as to settle the basic issue of what kind of party should we construct and how to construct our party.

Key words: mind liberation; market economy;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ownership system; important idea; the important idea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自 1992 年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第二次是以十五大报告为标志; 第三次是以江泽民“七一”讲话为标志。本文将对这三次思想解放的背景、过程、主要内容及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

一、第一次思想解放, 使我党逐渐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以市场为取向,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不断进行改革。

改革使市场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在认识上, 很多人仍然固执于市场经济偏见,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经历了一个很不平静的时期; 在国际上,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 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 在国内, 1989 年发生了“六四”风波, 紧接着“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因此, 人们将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一场反改革、反市场经济的思潮兴起, 人们陷入姓“资”与姓“社”的争论中。争论实质是如何看待十余年的改革开放, 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 同时也渗透着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问题。面对如此问题, 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依据来剪裁实践, 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理论呢? 这样, “什

收稿日期: 2003-03-27

作者简介: 叶 兵(1979-), 男, 安徽长丰人,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研究生。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便被迫切地摆到了党的面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对此有一个逐渐深化认识的过程。1980年,邓小平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阐述,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叫社会主义。”^[1]随后,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讲到:“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首要的。”^[2]1984年6月,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侧重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邓小平同志的本质论使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我们党逐渐加深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理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3]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明确认识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3],这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展了经济理论探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视野,加快了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1987年党的十三大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的论断把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水平。随

后,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基本上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这样谈论社会主义只注意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忽略了生产力水平。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考虑如何尽快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按所谓的先进模式尽快升级,追求“一大二公”,而忽略了这样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严重脱离了生产力水平,从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教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包括生产力原则、生产关系原则、生产目的原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三个原则之间是具有位次顺序的:消灭剥削原则,要服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标准,即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优先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标准,即要坚持效率优先。因为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不到一定水平,即使暂时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这也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在《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社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所以,我们要改革,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能因负面影响而否定改革;要明确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才能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其次,解决了姓“资”与姓“社”的争论,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精辟论断,强调计划和市场是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了基础。实际证明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只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可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这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基本上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二、第二次思想解放,深化了对所有制问题认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

党的十四大以后至十五大以前,这段时间是我国改革和发展处于比较好的时期,社会全面进步,经济蓬勃发展,成绩显著。然而,经济建设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严重亏损,资产负债率高,而且国有企业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率有所下降。因此,国企改革刻不容缓,但是如何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呢?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会不会使国有资产私有化呢?面对传统所有制理论的束缚,我们是大胆创新还是停止不前呢?人们再次为姓“公”姓“私”的问题所困惑。

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我党先前已进行过有益的探索。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一定范围的劳动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须补充。”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指出,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鼓励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首次提出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经营。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把私营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正式写进了党的文件,指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突破了社会主义和私有经济水火不容的观念。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1997年,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对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主体地位、所有制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这标志我们党的一次思想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一在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方针提升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指出“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修改宪法,使之正式化、固定化。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最大的贡

献是突破了唯公有制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维定势,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内;从实践的角度看,它体现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必定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外,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还可以避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左”和“右”的倾向。因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避免了“右”;使“多种经济经济制度长期发展”法律化,从而克服了多年以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盲目追求生产关系升级和对“公有制经济”过分崇拜的倾向,为完全按中国实际发展水平来构筑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为非公有制经济所有者吃了定心丸,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其次,科学阐述了公有制经济的内涵,明确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标准,有利于人们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种优势即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有质的优势,要注重质的提高。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些新的论断让人们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所有制模式的局限,进一步理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是要求在每个行业、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占优势,而是突出了总量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质上;明确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的控制力上,在这个前提下,国有比重下降一点不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组、改造、兼并方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区分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明确所有制形式应该多样化。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公有制等同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混为一谈,二者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公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所有,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主义性质;而公有制实现形式则是指公有资产的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属于方法手段问题,不属于制度范畴。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而,同一种所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所有制可

以采取同一种所有制实现形式。所以,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而且必须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组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突破了姓“公”与姓“私”的争论,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公有制经济带来活力。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基本解决了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这一基本问题

人类迈入21世纪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变比:从国际上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种力量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地分化和重组;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同时,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和老党纷纷丢失政权。这些给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压力和警示。从国内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一些矛盾也凸显出来,如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分配差距问题,如何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问题,如何应对加入WTO的形势等问题。这些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考验。从党内来看,经过50多年的执政,我党面临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青年干部的培养问题,党内腐败问题等,这使中国共产党的党建面临新的挑战。总之,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面临诸多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经受住新的考验,我们党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关键在于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紧紧抓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本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深圳市龙岗区考察时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这是江泽民第一次完整的提出“三个代表”这一科学思想;2000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上海时,分析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强调“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都应贯

穿‘三个代表’要求”^[5]。这是从基层组织建设角度对“三个代表”思想展开论述;200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全面贯彻执“三个代表”思想。这是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角度来阐述“三个代表”思想。2000年10月,在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开展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看看我们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坚持,不符合的就要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5]这是从党建角度提出了检验各项工作标准,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2001年7月,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标志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解决了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中共80年历史经验,深入了解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联系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所作的科学结论。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它科学的界定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阐述了党先进性的内涵,明确判断一个政党先进性的标准;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将党的先进性放进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的三个“始终代表”从动态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与时俱进,即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提出的新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的重大变化来思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主要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党,怎样建设党”基本问题。后者与前者本质是一致的。因为要解决“什么是社

(下转第30页)

难冠之以全盘反传统的称号。其一,晚年毛泽东诚然掀起过一场反儒的思想政治运动,但他在批儒的同时又崇法,并以秦始皇加马克思作为自己的人格注脚。法家、秦始皇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晚年毛泽东批儒时,同样流露出相当浓厚的传统观念意识,他不仅神往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大同理想,而且津津乐道于张鲁式的所谓“社会主义作风”。其反传统的思想实质不过是以传统反传统,即以墨反儒,以褒扬墨学思想以及社会底层的反主流文化,贬低儒家正统思想来实现传统的重建,完成对民族文化传统内部正统文化与反正统文化在地位上的根本置换,建立起以墨家文化、“老粗”文化、受压迫者文化为主流的与其理想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秩序。其三,严格地讲,即便是对于儒家正统文化,晚年毛泽东的反传统也仅仅停留在显意识层次,就潜意识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心态而言,那根深蒂固的“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那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理性上、主观上,毛泽东是反传统的,但在感情上、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回归传统,尤其在晚年,毛泽东的人格悲剧就在于传统文化性格的日益凸显、膨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出现重大偏差。

应当指出,正因为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乃是现代

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人格凝聚,毛泽东的文化思路历程乃是两大文化交融的漫长历程的缩影,它深刻地昭示了一个民族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面前,在创造性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几代人的长期探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说的:“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在 20 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要由单独一个人来逾越是太艰巨了。”^[3]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内在的、深刻的、丰富的;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也是一贯的,其中的冲突与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近现代中国曲折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心态变迁的缩影,是中西方文化交融、冲突的必然产物。他不仅代表了一个人,而且代表了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和无奈选择,其贡献遗惠于今天,其失误也警醒于当世。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施拉姆.毛泽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 19 页)

会主义”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探讨,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性规定,直接关系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弄清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为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前一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后一问题解决。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实践意义。“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 80 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实践证明,我党之所以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关键在于这三个阶段我党能够比较好的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我党之所以出现

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就是偏离了“三个代表”要求。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方向,为新世纪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文选(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72.
- [6] 李永清.邓小平理论发展与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杨彬智]